

为“完成指标”，2000万元建大棚多成摆设，变相“发钱”养懒汉……

“指标扶贫”带偏了脱贫攻坚



漫画：曹一

能按时花出去，扶贫项目草草报，扶贫资金打水漂。

“当时考虑的是把钱花出去，不管怎么样先把考核指标完成，我们也没想到发展成现在这样，100多万元眼看着就这么打水漂了，确实浪费得心疼啊。”上述村干部说。

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这个贫困村所在的县里，14个贫困村中有11个与该村类似，“拍脑袋”选择了大棚蔬菜产业，共新建蔬菜大棚2200多亩，仅大棚造价就在2000万元以上，但当地多位驻村扶贫干部坦言，“一年过去了，多数大棚都成了摆设，没有产出实际效益。”

能按时花出去，扶贫项目草草报，扶贫资金打水漂。

“当时考虑的是把钱花出去，不管怎么样先把考核指标完成，我们也没想到发展成现在这样，100多万元眼看着就这么打水漂了，确实浪费得心疼啊。”上述村干部说。

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这个贫困村所在的县里，14个贫困村中有11个与该村类似，“拍脑袋”选择了大棚蔬菜产业，共新建蔬菜大棚2200多亩，仅大棚造价就在2000万元以上，但当地多位驻村扶贫干部坦言，“一年过去了，多数大棚都成了摆设，没有产出实际效益。”

农户贷款企业用，扶贫变“发钱”

每个贫困户每年必须要完成一定量的贷款任务，为通过考核验收，“户贷户用”变成了“户贷企用”。原本精准到人的金融扶贫政策，变成了一些企业低成本融资的新渠道

夏日炎炎，骄阳似火，66岁的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大路乡大路村贫困户张久持，热情招呼着在葡萄园里采摘的客人。

得益于小额扶贫贷款这一金融扶贫政策，去年4月，张久持从银行贷款4万元，利用之前在葡萄园打零工学到的种植技术，承包3个大棚，种上了900株葡萄。

“以前一年也有5万块钱的贷款，说是给我们贫困户的贷款，但也没看到过钱，每年就拿3000元的分红。”张久持告诉记者，现在有技术又有钱，就自己干了。去年净利润有2万，今年估计能挣3万。

“我懂技术，早就想自己种了，以前可不就是没钱啊！”望着一株株结满果子的葡萄藤，张久持用黝黑的手臂蹭了蹭脸上的汗珠，笑得合不拢嘴。“感谢政府给我这个老头子办了贷款，还免除了棚租费，以前就等着政府发钱过日子，现在自力更生，越干

越有劲头了，没想到我一把年纪还过上了新生活。”

小额扶贫贷款让张久持在临近古稀之年过上了幸福生活，然而，并非所有贫困户都能享受到这项资金扶持。

与张久持一镇之隔的冯庙镇大王村贫困户王嫩喜，根据政策可以享受到5万元的小额扶贫贷款，然而，由于被村里认定为缺乏技术和市场，以他和其他一些贫困户名义申请到的扶贫贷款最终以入股方式交由当地一家家具厂使用，他们这些贫困户则定期拿些分红。

据了解，扶贫小额贷款是近年来广泛推行的金融扶贫政策，主要用于帮助贫困户解决生产发展中遇到的资金难题。然而，这一原本精准到人的金融扶贫政策，在一些地方却出现“跑偏”，变成一些企业低成本融资的新渠道。

全国扶贫办的督查显示，全国扶贫小额信贷已累计发放4700亿元，其中“户贷企用”的现象较为突出。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在2018金融扶贫培训班上表示，“户贷企用”使贷款没有真正用在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上，违背了政策设计的初衷。

据了解，扶贫贷款之所以从“户贷户用”变味成“户贷企用”，有客观原因，即一些贫困户本身能力不足，不具备发展产业的能力，为了增加这部分贫困户的收益，相关部门想到了“户贷企用”的办法，既可确保贷款资金使用安全，也能稳定增加贫困户收益。

不过，一些基层干部和扶贫主管部门也承认，由于扶贫贷款也有指标考核，特别是前几年，每个贫困户每年必须要完成一定量的贷款任务，实行“户贷户用”很难达标，为了通过考核验收，就变通想出“户贷企用”的办法。

“贷款给企业省心，而且指标分发下去完成得也快。”一位基层干部表示，为了方便工作，以促进贫困户发展生产为宗旨的扶贫小额信贷，大部分是企业在用，造血扶贫变成了“发钱”。虽然国家扶贫办去年11月就规定禁止“户贷企用”，但在基层，“户贷企用”的比例依旧居高不下。某贫困村2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仅2户申请了“户贷户用”，剩余25户依旧是“户贷企用”。

安徽一家银行的基层分支机构负责人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基层信贷力量配比原本就薄弱，而“户贷企用”手续相对简单，银行也更愿意放款。要贷款给贫困户，贷前、贷中都有十分严格的审查，贷后监管工作也很复杂。对银行来说，放贷成本远高于“户贷企用”。

扶贫小额信贷在基层颇受本土小微企业欢迎。一家使用了扶贫小额信贷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当前融资难、融资贵的大背景下，扶贫小额信贷为小微企业提供了融资渠道，融资的综合成本较低，且不需要任何抵押物。扶贫小额信贷折算的贷款利率在7%左右，而受当下融资环境影响，小微企业几乎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多元渠道的融资贷款利率则在10%左右。

安徽省农经学会会长胡桂芳表示，“户贷企用”从表面上看，似乎一举两得，既解决了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又让贫困户获得了一定收益。然

而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其实等于变相给贫困户“发钱”，存在“泛福利化”的问题，并没有起到“造血”作用，难以形成贫困户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一旦政府调整优惠政策，或企业出现经营风险或债务负担，都会转嫁到贫困户身上，不仅有违扶贫初衷，还可能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指标化、运动式”现状亟待改变

一位基层扶贫第一书记坦言，每次县里下发这类考核指标，他就夜不能寐，连做梦都在想着完成任务指标，根本无心其他工作

多位基层干部认为，扶贫工作任务艰巨，程序复杂，为落实责任，突出考核导向，促进脱贫是必要的，也能客观全面地反映基层工作，但过度追求“扶贫指标”甚至不切实际限时限量完成“扶贫指标”的做法不可取。

“上个月下达扶贫小额信贷的任务，要求我们村‘户贷户用’不得少于7个人，一个星期之内完成。”一位基层扶贫第一书记坦言，每次县里下发这类考核指标，他就夜不能寐，连做梦都在想着完成任务指标，根本无心其他工作。“一听到上级要来检查，连着几天夜以继日地赶制文件和表格。”

部分基层扶贫办负责人也表示，扶贫工作的考核指标有跑偏的倾向，造成任务指标化、工作运动式。“不管结果怎么样，总之这个工作是做了，任务完成了，考核就有分数了。”该负责人说。

各地之所以出现指标扶贫的“歪风”，首先是当地扶贫工作主要负责同志缺乏担当意识。在指标上下功夫，上级主管部门来督查，看指标完成得都不错，对部分领导同志来说容易出成绩。

其次，各地在没有充分了解贫困户需求的情况下去定奖补标准和贷款任务，让工作规划失去了科学性和精准性，“大水漫灌”助长了贫困户“等靠要”的思想，无法有效地激发贫困户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些基层干部呼吁，上级主管部门要改变扶贫考核的指标导向，防范利国利民的扶贫工作演变为“指标扶贫”。上级对于主管部门的考核要向实际成效倾斜，考核到扶贫工作的最后一公里，不能不看“疗效”只看指标。

胡桂芳表示，扶贫考核指标要少一些形式主义，多一些从实际出发。“基层情况千差万别，指标不能一刀切。”要充分发展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了解贫困户的生产生活需求，因地制宜制定考核指标，让指标真正用在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上，用在激发贫困户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上。

赵晓平建议，扶贫工作要有担当意识而不是唯指标论，要摒弃运动式工作，防范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多在帮助贫困户脱贫增收上下功夫，制定科学合理的扶贫规划，防止好政策到了基层沦为笔烂账。

37个女大学生返乡创业卖杂粮是怎样一种体验？

我们“打入”农村女创客队伍“撬”故事



▲三位记者与洮宝大学生们在田间劳动后留影。 本报记者许畅摄

奢侈记忆。农业创业园的食堂也很接地气，园子里长什么就吃什么，开始我们觉得绿色健康，可是吃久了，也不禁开始想念烧烤火锅，想念城市里的夜生活。蓬头垢面的我们到了第四五天就有点吃不消，然而一看到创业园里的姑娘们都性格开朗，每天素颜朝天地去工作，面对艰苦，应对自如，我们也不服输地坚持着。

与生活中的困难相比，工作上的融入才是更大的挑战。以往的工作中，我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但在创业团队中，这种规则是被打破的。挑米除草、电商运营、文案策划，多职工作意味着“哪里需要你就去哪里”。

挑米的时候总会累到双眼昏花；去田里除草总会晒到皮肤过敏；做电商和微商要耐心地回答每个客户的问题、想方设法地推广；做直播运营就要时时保持热度、时时与网友互动，直到嗓子

哑掉……然而慢慢地，在姑娘们创业热情的感染下，我们从对加班的抱怨中逐渐解脱出来。当挑出的米被装入真空袋中准备发走，当看着大片大片的稻穗在风中摇曳，当看到一个订单被促成，当想出一个极具新意的情人节推广文案，那种成就感是实打实的。不时尚、不化妆、不防晒也没什么大不了，有同伴、有目标、有信仰才有内心的丰盈和富足。

真诚的相处换来真诚的故事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回农村创业吗？”开始，我们总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建设家乡”“发展东北”，种种“标准答案”却总是不能说服我们。37名女大学生真的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回乡创业的吗？

在同甘共苦的日子里，我们终于能够逐渐走进姑娘们的内心世界。每次开会，我们也不再被当

成旁观者。

有一次，我们陪其中几位创业姑娘去镇里参加一个荣誉颁奖活动，就在街边露天举行，临时搭建的展台在烈日下显得有点草率。

结束后我们互相分享着自己的经历，曾经也是光鲜亮丽生活在城市里的白领，曾经参加的也是在五星级大酒店里的高大上活动，漂泊的心境几乎找到了共鸣，那段对话让记者记忆很深刻。

记者说：“挤早高峰的地铁总是每天怀疑人生的高发时段。”一个姑娘谈及了逃离大城市的话题，她说：“那种生活不是我们想要的，回乡卖豆听起来像小打小闹，但是能在家乡自己做出事情来反而找到内心的自由了。”

渐渐地，我们从有距离的观察者逐渐变成融入其中的参与者，成了能够互相倾诉的朋友。“回来就不能创造价值吗？这是刻板印象。”“吃苦怕什么，漂泊的苦和创业的苦，我更愿意选择后者”……在相互熟悉的过程中，我们了解了很多背后的故事，有的想回家照顾伤病的家人，有的厌倦了大城市的漂泊，有的眷恋家乡又想要有趣的工作……真诚的相处不仅给了我们全新的视角，也让我们理解了农业创业背后的坚持与梦想，理解了这些返乡创业女大学生的理由和执念。

每每去城市做展销的时候，这些农村创业的姑娘们又会摇身一变，“走，西单吃冰去！”她们从未忘记城市生活的繁华，却不把那种繁华当作生活必需的标准。

后来，我们没再问过自己那个假设的问题，而是每天忙碌于创业园里的工作和生活，在和农民接触的过程中也深感创业带头人的作用。曾经一火车绿豆赚50元的洮南农民在女大学生们的影响下也在转换思路，所谓乡村振兴正是在这一点一滴中积累起来的。

创客光环背后的焦虑与烦恼

人们常对这些洮宝女大学生的创业故事津津

乐道，她们身上有着各种各样的标签，“返乡创业”“品牌明星”等。而她们也总是展现出最积极快乐的一面。当我们扎根其中才了解，铅华之下洮宝的艰辛与挑战从未停止。

农业创业最重要的就是和农民、和土地、和粮食打交道。当我们去农村亲自向农民推广标准化种植的时候，很多农民都不认同。不少加入合作社的农民口头上答应，私下里还是按照自己的“土方法”，用化肥和农药种地，这让我们非常头疼。

女大学生们“跳出农门”又回到农村，如何接地气、如何与基层建立沟通机制是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日常工作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些大学生们的经验不足，很多专业性的工作都是在摸索中完成的。

洮宝创始人王荷和爱入张米克每天都要加班到深夜，从签订合同、订单发货、培训农户到采购电脑，事无巨细。我们发现，在创业的光环背后，让公司人才结构完善成熟，也是初创企业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烦恼和焦虑，这些回到田间做起“新农人”的大学生仍然让我们敬佩。毕竟，我们的“创客生活”只有两周的时间，她们从初创阶段一路走来，还要继续走下去。

我们常常探讨人生选择的对错，其实人生路就在脚下，只要踏实地走好每一步，在田间、在城市又有什么区别？离开洮南的时候，我们又回头看了一眼洮宝的大花布广告牌——立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有种“孤胆英雄”的气概，仿佛诉说着新农人“就是在乡村创出名堂”的决心。

扫描二维码，看更多“洮宝”女大学生创业故事



“

“花钱有任务，项目有指标，不求效果佳，但求不扣分。”如果各地没有充分了解贫困户需求就去制定奖补指标和贷款任务，就会让扶贫工作规划失去科学性和精准性，“大水漫灌”助长了贫困户“等靠要”的思想，无法有效地激发贫困户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本报记者杨玉华、吴慧珊

“花钱有任务，项目有指标，不求效果佳，但求不扣分。”这是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日前在基层采访时，听到的一些基层扶贫干部打趣的说法。略显夸张的言语背后，透露出扶贫干部对“指标扶贫”的无奈。

部分基层干部群众反映，近年来，一些基层扶贫工作被简单化变成下任务、定指标，并按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导致扶贫工作“跑偏”。特别是在扶贫投入方面，使用产业扶贫资金有指标、发放扶贫小额信贷也有指标，为足额定量完成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指标任务，一些地方只能“突击”花钱，在缺乏科学规划的情况下拍脑袋决策、简单化分钱，导致扶贫资金被滥用甚至冒用，没能真正惠及贫困户。

扶贫项目草草报，扶贫资金打水漂

一个县14个贫困村中有11个“拍脑袋”选择了大棚蔬菜产业，共新建大棚2200多亩，仅大棚造价就在2000万元以上，但多数都成了摆设

“转眼快一年了。”贫困户胡荣华说，“还是没有等到政府曾经承诺的分红。”每天经过村头的这片大棚地，他都会不由地生出埋怨。

“去年村里跟我们说得好好好的，今年一季度就有分红了，今年过去一大半，到现在也没见着动静，这不是哄我们老百姓么？”胡荣华说，本来盼着产业大棚致富，现在却落空了。

胡荣华是中部省份一个贫困村的村民，他所说的大棚曾是当地政府紧急上马的一个年度扶贫项目，然而钱花了却并没给他们带来实惠。

熟悉内情的当地驻村扶贫队长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去年年底，上级部门紧急下达产业扶贫任务，要求在30天内把打到村账上的产业扶贫奖金花掉。为完成任务，村里只好突击花钱，在没有经过科学规划和论证的情况下，花费140余万元，盖了140亩蔬菜大棚。

“要是账上的钱不花出去，上面来督查，又要

“

当得知在吉林洮南这个贫困县，有37个女大学生先后返乡创业卖杂粮，县城长大、大学毕业留在大城市工作的女记者邵美琦第一反应是“不理解”。

就像当年著名的“北大才子卖猪肉”，冲动？噱头？人才浪费？

与其满腹质疑，不如亲身感受，到基层扎根，认认真真做一下“创客”。7月酷暑，本报记者邵美琦和两位同事一头扎到洮南，开始了在洮宝大学生创业园的创业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零距离体验创业的“苦头”和欢乐，体验了什么叫青春梦想

本报记者邵美琦、李双溪、许畅

大学生在农村当创客是怎样的体验？

记者下乡采访是家常便饭，“苦头”的世面也见过不少。一开始的时候，去农村创业这件事并没有把我们吓住，“吃苦没问题啊，能有多苦”“种地除草我都行”……

这些信心在现实面前——被粉碎，这种现实叫作“创业维艰”。生活上的艰苦是最直观、最切肤的。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没有任何电器，洗澡也要靠运气，晚上总是热得辗转难眠、汗如雨下，“躺在空调房里玩手机”成了我们共同的城市